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
浙江理工大学学术专著出版资金资助

五四前后英诗汉译的 社会文化研究

English Poetry Translation in
China Around 1919
— A Social-cultural Perspective

蒙兴灿 著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
浙江理工大学学术专著出版资金资助

五四前后英诗汉译的 社会文化研究

English Poetry Translation in
China Around 1919
—A Social-cultural Perspective

科 学 出 版 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四前后英诗汉译的社会文化研究 / 蒙兴灿著. —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9

ISBN 978-7-03-024967-8

I. 五… II. 蒙… III. 英语-诗歌-翻译-研究-中国-现代
IV. 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14809 号

责任编辑: 朱 琳/责任校对: 鲁 素

责任印制: 赵德静/封面设计: 无极书装

联系电话: 010-6403 0529 电子邮箱: zhulin@mail.sciencep.com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编务公司排版制作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9 年 7 月第 一 版 开本: A5 (890×1240)

2009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9 1/4

印数: 1—2 000 字数: 302 000

定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科印〉)

序 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直到今天为止，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社会的各种景象，还可以到五四前后去寻找端倪。因而，近二十多年来，反思五四及五四前后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及其对其后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成了学术界一个经久不衰的热点。但在这些研究中，有一个方面却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这就是诗歌翻译。如果我们同意中国的现代性是一种“翻译的现代性”，那么诗歌翻译就是造成这一“现代性”的重要开端；如果我们同意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从文学革命开始的，那么诗歌翻译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着棋；如果我们要证明五四带来的中国引进西方思想有“正打正着”、“歪打正着”以及“正打歪着”的话，那么诗歌翻译也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谓予不信，请读蒙兴灿君的这部《五四前后英诗汉译的社会文化研究》，他的研究可说是为上述诸方面提供了最好的论证。

古人说：“造化弄人。”表明了人们对于历史的无奈。我有的时候真觉得这句话不无道理。事实上，历史的必然性常是由一些偶然性造成的。比方说，中国社会发展到清末民初，一场文化革命的暴风雨正在酝酿，发生是迟早的问题，但是，这场革命何时到来、以何种形式发生、向什么方向发展，却谁也难以预料。这时，个别人物的独特遭际，以及他随后的行为，这些偶然性的因素就会给事物的必然性加入巨大的个人影响，甚至决定了事件行进的方向。不管这个方向是预期的、是希望的，还是不希望，到了那时，历史似乎没有了选择。胡适，正是那个特定时期的特定历史人物。如果胡适不是到美国留学，如果他到美国没有正遇上美国诗歌的“现代化”运动，如果没有接触到美国意象派诗人的革新宣言并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其实，这些“如果”并非不可能，只要他晚去美国十年，一切就都不一样了），恐怕就不会有他的《文学改良刍议》及由此而掀起的狂风巨浪，也不会有“新诗”经过近百年的实践仍找不到

出路这种让人难堪又徒呼奈何的现象。这一切，正是在当时就播下了种子！

五四从文学革命起步，而文学革命的主要目标是革旧诗的命。胡适看得很清楚，所谓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成败的关键看诗歌。白话文在小说词曲演说等领域取得胜利是不难的，最大的阻力在旧诗，“待到白话征服这个诗国时，白话文学的胜利就可说是十足的了。”因为词曲小说之用白话，宋元就已有了，时报议论演说文字用白话，梁启超也已开了头，现在就算取得胜利也没有很大的意义。只有诗才是传统文学真正的灵魂、传统文人最后的精神归宿。推翻了旧诗就是对传统文学釜底抽薪，旧文学就再也没有复兴的可能。因而胡适自承在美国时考虑的文学革命问题始终在诗歌，他受到影响的美国新思潮也是“新诗”运动，而他提出的文学改良“八事”受到意象派主张的启示，也明显主要是针对旧诗的。美国的“新诗”运动不过是一段时期的风潮，“自由体”诗虽然产生了一些影响，也只是增加了一种诗体，并没有改变英语诗歌的基本传统，但在中国却造成了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从此旧诗作为旧文学的代表一蹶不振，整个旧文学也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从此断成分明的两截，再也无法相接，“诗国”之美誉也永远成为了历史的记忆——昔时识字均能诗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今天还会写诗的中国人已寥寥无几了！随着旧诗进入历史的是作为其基础的字锻句炼的语文修养工夫。五四胜利了，中国进入了现代期，而我们花的代价是彻底割断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

与历代文学的演进都是内部的渐进不同，五四的文体变革是革命式的突变，其动力不是来自内部，而是来自外部。不但思想来自外部，方法来自外部，连形式也都来自外部。这种借外力以改造内部的途径就是翻译。因而在五四引起的社会变革中，翻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没有翻译就不会有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这一文学翻译又是由诗歌翻译导乎先路的。胡适自己也非常明白这一点，因此他不把他自己的或者其他人（如许多人说的是沈尹默）写的新诗作为新诗的开端，而把他1919年翻译的一首“平平常常的英语抒情小诗《关不住了》作为新诗成

立的纪元性作品”，其中就很有深意。而五四后新诗走过的百年道路，大多也是通过翻译、模仿来进行的。新诗的成就在此，新诗的失败也在此。

以上这些情况充分证明了翻译不是一种纯粹的语言活动，而是与社会文化的发展演变有着深刻的联系。这是翻译研究的一个好题目。我非常高兴兴灿选了这么一个好题目，而且完成得如此雄辩、有说服力。文中谈了五四前后，其实重点是五四“后”，“前”只是作为一个铺垫，同时也是一个比较的对象。这样的安排也颇为妥当。

本文除了在大局上提出了一些非常有意义的见解之外，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兴灿也注意到了一些前人多不曾注意的细节。其中人们容易看到的是，他一反几乎已成定论的钱钟书关于《人生颂》是第一首汉译英诗的主张，而根据对“翻译”的理解，把“最早”的名誉归给了半个世纪后的严复，这自然可以讨论。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还提出了中国新体诗的形成受到了基督教赞美诗翻译的影响，汉诗诗体的“散文化”、大众化趋势还应往前追溯。这一见解具有开拓性，尤其是如果我们想到英语发展过程中，16世纪教堂赞美诗及其后《圣经》的翻译对现代英语的形成的影响，就可见这也许是一个很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好题目。我期待着兴灿能循着这一思路往前再深入开掘。

本文曾得到英语专家和翻译理论家戴炜栋、郭建中、谢天振、张春柏、周国强、傅惠生、邵志洪等的审阅和指导，诸位专家都提出了很好的意见。郭建中先生更慨然应允为此书作序。作为蒙兴灿的博士导师，我也要对以上几位教授、特别是郭建中先生表示深深的谢意和敬意。

是为序。

潘文国

戊子年除夕即2009年1月25日于上海寓中

序 二

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五四时期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社会转型期。根据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上的论述，把五四运动不局限在 1919 年，而是上溯到 1915 年，下探到 1921 年；内容上，也不局限在爱国政治运动而包括新文化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所以把 1915—1921 年称为“五四运动时期”。至于“五四前后”的概念，就比较模糊了。论者可根据自己论述的对象来界定。蒙兴灿根据诗歌翻译发展的脉络，界定在 1898—1927 年。这一界定也是有根据的，因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文学翻译始于近代。五四以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则是晚清外国文学翻译的继续，尽管有本质的不同。从翻译作品的选择来看，清末民初的翻译选择比较散乱，而五四以来，翻译界就有目的地介绍现实主义，尤其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以及被压迫、被损害的民族的文学。而且，五四新文学的先驱者们，可以说，无一例外地是从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的。¹

五四前后的外国文学翻译早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著书立说者颇多。尽管已有不少优秀的著作，但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结合文化翻译理论来探索、考察、分析和研究五四前后英诗汉译的专著不多，蒙兴灿的这部著作，可说是填补了五四前后外国文学翻译研究的空白。

蒙兴灿同志选择诗歌翻译为其研究对象，也很有见地。其一，因为尽管小说翻译的数量大于诗歌翻译，但据考证，诗歌翻译早于小说翻译。我国最早完整的翻译小说是 1873 年初孟勺居士翻译的英国长篇小说《听夕闲谈》，而我国最早译成汉语的英语诗，根据钱钟书先生所见，是美国诗人朗费罗传诵一时的作品《人生颂》，时间应在 1864—1865 年之间。而本书中提到，据沈宏、郭晖近年考证，中国最早的译诗推前了 10 年，

1 在这一时期，我国文学翻译出现了一个逐步繁荣的局面，到五四时期达到顶峰。

即 1854 年在香港出版的中文期刊《遐迹贯珍》9 月号上刊登的英国诗人弥尔顿的十四行诗 *On His Blindness* 的汉译。周振鹤在《文汇报》2005 年 4 月 25 日发表的文章,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其二,与其他文学样式如翻译小说和翻译戏剧等相比,译诗对中国新诗形成和发展的影响比对中国近代小说和戏剧的影响更为明显。

《五四前后英诗汉译的社会文化研究》运用当代西方文艺批评理论、文化批评理论和当代文化翻译理论,从社会文化因缘、社会文化心理、社会文化功能以及译学社会文化分析和译学社会文化行为反思等五个方面,结合对中国五四前后三十年间英诗汉译经典文本的分析,论证了这一独特历史时期英诗汉译对中国新诗的形成和发展的关系与影响,具有相当的创见。

作者对五四前后英诗汉译的三个阶段的分期非常正确,对此时期英诗汉译的原始资料做了深入的挖掘,为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作者对西方翻译研究相关理论的最新进展相当熟悉,做了正确的、言简意赅的总结,并且能得当地运用到自己的研究课题,得出自己的结论。

本书在五四前后英诗汉译的社会文化研究方面,贡献是多方面的,具有开创性,并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作者把勒弗维尔的诗学概念分为翻译的社会诗学和个人诗学,以此解释了五四前后的翻译现象,拓宽了这一理论的应用范围,丰富和发展了文化翻译学理论。作者成功地利用中国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文学翻译(英诗汉译)的现象,验证和丰富了西方文化翻译学派的理论,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其研究的方法,可拓展到文学翻译其他研究领域和时期,如西方小说或戏剧的汉译对中国现当代小说和戏剧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如 20 世纪 80 年代西方文学汉译兴起高潮的社会文化背景分析等。

考虑到当代翻译研究已开始从文化研究拓展到社会学研究这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可以认为,蒙兴灿同志的这部专著站到了当前翻译研究的前沿。

外国文学的翻译,纳入翻译文学的范畴,并成为中国近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已成为学界的共识。翻译文学对中国现当代

文学的重大影响，也是众所公认的，五四新文学正是在翻译文学的影响下形成和发展的。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离不开对翻译文学的研究。应该说，研究翻译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形成和发展的影响，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课题。因此，蒙兴灿同志的研究，从诗歌这一文学样式出发，专门研究了英诗汉译对中国新诗形成和发展的影响，无疑是这一重大课题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也自然成为这一课题研究成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书后的附录“五四前后(1898—1927)英诗汉译作品总汇”，作者是花了工夫的，并将成为研究这个时期英诗汉译的宝贵参考资料。

作者研究方法科学，所用材料例证丰富，对引用的诗歌翻译评析精当，解释合理，并能提出自己的见解。至于新诗定型的问题，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作者能提出见解，也是难能可贵的，说明作者有自己的独立学术观点。

蒙兴灿同志师从潘文国教授。潘教授既精通汉英对比，又熟悉中外翻译理论。从蒙兴灿同志的这部专著中，我们也可以窥见潘教授的治学方略和方法。

这部专著是蒙兴灿同志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结合最新研究资料而成。受潘教授之托，我曾审阅了那篇博士论文。当时给我的印象就很深刻，是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故当蒙兴灿同志告知新成果将正式出版，并嘱我作序时，我欣然从命。是为序。

郭建中

2009年春节前夕

目 录

序一	潘文国 i
序二	郭建中 v
第1章 绪论	1
第2章 五四前后英诗汉译的社会文化因緣	11
2.1 “文化”概念的泉源与厘定	11
2.1.1 “文化”概念的哲学泉源	11
2.1.2 “文化”概念的文学泉源	14
2.1.3 “文化”概念的人类学和社会学泉源	18
2.1.4 “文化”概念的厘定	20
2.2 文化形态与中国近现代翻译	22
2.2.1 器物文化与格致之学的翻译	23
2.2.2 制度文化与政事之书的翻译	26
2.2.3 精神文化与诗赋词章的翻译	29
2.3 社会文化背景墙与五四前后英诗汉译	36
2.3.1 近代中国面临的危机和由此产生的社会文化思潮	37
2.3.2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思潮	39
2.3.3 五四前后英诗汉译流变的基本走势和特点	40
第3章 五四前后英诗汉译的社会文化心理	54
3.1 社会文化心理与近代英诗汉译的古代性	55
3.1.1 翻译本质的双重性与中国近代翻译	55
3.1.2 语言的社会文化心理属性和近代英诗汉译的古代性	60
3.2 社会文化心理与译诗体的陌生化和传统化	67

3.2.1 危机背景下的文化心态和诗歌翻译的矛盾心理	67
3.2.2 五四前后英诗汉译中陌生化与传统化的相互碰撞与相互对话	70
3.2.3 五四前后英诗汉译中文体的陌生化和传统化与文化的解构和重构	71
3.2.4 五四前后英诗汉译中文体的陌生化与译诗体的叛逆性创造化	72
3.3 社会文化心理的嬗变与译诗主题的流向	74
3.3.1 社会文化心理与诗歌翻译的救亡启蒙主题	76
3.3.2 社会文化心理与诗歌翻译的爱国抗争主题	80
3.3.3 社会文化心理与诗歌翻译的人道关怀主题	83
3.3.4 社会文化心理与诗歌翻译的文学艺术主题	87
第4章 五四前后英诗汉译的社会文化功能	95
4.1 五四译诗与时代精神	95
4.1.1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的文艺复兴	97
4.1.2 五四译诗与中国的文艺复兴	100
4.2 五四译诗对早期新诗的影响	107
4.2.1 “新诗”的缘起小考	107
4.2.2 译诗与新诗诗体重建	116
4.3 论译诗《关不住了》之新诗成立纪元性	130
4.3.1 英美意象派诗歌与五四新诗运动	130
4.3.2 《关不住了》——“新诗成立的纪元”性分析	135
第5章 五四前后英诗汉译的译学社会文化行为分析	143
5.1 翻译的文化社会学观与诗歌翻译的社会文化属性	143
5.1.1 翻译的文化社会学观	143
5.1.2 诗歌翻译的社会文化属性	150
5.2 五四前后中国的意识形态与诗歌翻译的互动	155
5.2.1 五四前后中国的意识形态	157
5.2.2 五四前意识形态影响下的诗歌翻译文本选择	159

5.2.3 五四后意识形态影响下的诗歌翻译文本选择	163
5.3 译者主体性与五四英诗汉译取材	168
5.3.1 意识形态的相对论与译者的主体性	168
5.3.2 五四时期朱湘的个性化英诗汉译	172
5.4 诗学规范与五四前后英诗汉译策略	180
5.4.1 广义诗学、狭义诗学和翻译诗学	180
5.4.2 诗学传统关照下的五四前后英诗汉译策略	186
第6章 五四前后英诗汉译的译学社会文化行为反思	197
6.1 近代西方传教士的翻译活动与五四时期的白话译诗	197
6.1.1 近代文学语言的历时流变：文言、古白话与浅近文言	197
6.1.2 西方传教士的汉语改造活动与胡适白话入诗首倡说存疑	203
6.2 五四前后的诗歌翻译与新诗诗体定型难的诗学反思	215
6.2.1 新诗的发生生态埋下了诗体定型难的隐患	216
6.2.2 草创时期的扭曲引进促进了新诗诗体建设自由化与格律化对抗	219
6.2.3 诗既无常体又有常体“悖论”中的诗体适度定型观	228
第7章 结语	234
参考文献	239
附录	255
后记	277

第1章

绪 论

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社会文化转型和文学嬗变的历史时期，外国文学的译介意义显得特别重大，一直受到翻译史家和文学史家的高度关注。翻译文学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载体，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19世纪70年代之后出现了翻译文学。翻译文学的出现，对于近代文学的发展和走向有很大的影响。在文学史的建构中重视翻译文学，反映出了一种新的文学观念。这种新观念始于1922年3月胡适论述近代文学的长篇论著《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但该文只讲了严复和林纾的翻译，而没有涉及近代的诗歌翻译。1929年出版的陈子展著《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作为率先提出“近代文学”概念的文学史著作，即于全书9章之中首辟“翻译文学”一章，除涉及翻译小说外，还论述了翻译诗歌。这些涉及或评论，“虽无什么独特的高见，但首介之功，当不能淹没”（郭延礼，2004：58）。可见近代文学学科创建伊始，翻译文学就成为有机组成部分且占有相应的重要位置。复旦大学编著的建国后第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史稿》，也特设“翻译文学”一章；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6种，收入《域外文学译文卷》和《俄罗斯文学译文卷》两种。新时期以来问世的四种近代文学史，均设“翻译文学”专章予以系统评介；1990年起《中国近代文学大系》陆续出版，其中《翻译文学集》3卷200万字，以全书十分之一篇幅，集中展示了近代翻译文学的整体面貌和突出成就，也为此后的纵深研究奠定了文献基础；1996年香港中文大学还举办了首届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并由王宏志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了论文集；1998年郭延礼著《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出版，成为首部系

统研究这一问题的学术专著。其后,王建开的《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1919—1949)》(2003)、王向远的《翻译文学导论》(2004)和谢天振的《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史(1898—1949)》(2004)以及廖七一의《胡适诗歌翻译研究》(2006)等一批有影响的学术专著相继问世,不仅进一步拓展了我国近代翻译文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昭示着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研究的光明前景,而且开启了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研究之门。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主要由翻译小说、翻译诗歌、翻译戏剧、翻译散文及翻译童话寓言等构成完整体系。虽然其中翻译小说数量最大,特色最著,成就最高,但却以翻译诗歌时间最早,既开近代翻译文学之先河,又以总体成就仅次于翻译小说而占有突出位置(龚喜平,2003:137)。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汉唐佛经翻译与明末清初科学翻译两大高潮,但文学翻译却始于近代。近代翻译文学的勃兴,成为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三次高潮,而其中的诗歌翻译,五四前后堪称中国文化交流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无论是译诗的数量、参与翻译的队伍还是译诗在当时产生的影响,都是史无前例的(廖七一,2006:4)。

20世纪7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打破了以往将研究视点局限于翻译文本和翻译活动本身的局面,将研究的触角延伸到了社会文化系统,从而大大拓宽了翻译理论研究的视野,丰富和发展了翻译理论研究的内容,同时也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然而,我们在文献整理中发现,关于五四前后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译界过去重点以语言分析和文本对照为主,关注的是文本该怎么译的问题,对翻译活动和接受社会主体文化之间的互动作用鲜有涉及。近年来社会文化的研究视阈虽然扩展到了这个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但大多仅以佐哈尔多元系统理论作为观照,对我国近现代翻译小说的有关方面进行了较为有益的社会文化考察,如社会文化对主体意识形态的影响,社会文化对翻译过程中文本转换策略的影响等(Lefevere, 1992; Venuti, 1992; 王东风, 2000; 孙艺风, 2003; 王友贵, 2003; 蒋晓华, 2003; 姜秋霞, 2003),且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翻译对主体社会文化和文学规范的影响。而对作为外国文学翻译的另一重要体裁——诗歌翻译更是明显关注不足,即使

作过一些零星的论述,也仅是把外国诗歌翻译对中国文学转型、白话新诗滥觞的影响作为个案来探讨(张旭,2004;廖七一,2006),并且这些探讨也仅仅是最近一两年的事,参与的人数甚少,远未形成规模。当然,之前也有一些笔记和评论文字,诸如译家翻译活动或其译品赏析,但多是对某一译品和某一文派即兴式的评论(张少雄,1994;刘全福,1999;张旭,1999;龚喜平,2003),也有关于译家和诗人真实姓名的考察和身世及译品的介绍和赏析(袁锦翔,1986;陈建中,1993;高健,1993;戴继国,1995;袁荻涌,1997;程翔章,2001),但总体说来还比较零碎、肤浅,缺乏系统性、逻辑性和科学性,更谈不上对近现代诗歌翻译整体的探讨和发展规模的揭示,如诗歌翻译中的主要译家译品、社团流派及其诗歌翻译现象等。诚然,上述研究和探讨毫无疑问都是必要的和有意义的,但是从社会文化视界全面考察五四运动前后译诗的勃兴与当时社会文化的关系,则鲜有论述。

由于诗是人的情感、思想、感觉的记录,因而我们最容易看到的是蕴涵在诗中的观念意识,而这些就是文化的内容;由于诗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由于它记录了人类心灵的历史,因此某种程度上更是文化的核心部分。美国文化学家 E. 拉兹洛说:“归根结底,文化是受价值引导的体系。”(拉兹洛,1986:2)而诗里往往直接表现了诗人的价值取向。如此说来,诗歌翻译无疑就是文化翻译,就是对诗人价值取向的翻译。而当今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为诗歌翻译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背景研究条件和坚实的理论根基。

实际上,在中国近代文学翻译中最早面世的是诗歌¹,而在近代诗歌翻译中,翻译数量最多的是英国诗歌(郭延礼,1998:82~91)。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无视当时这一重要文化载体的存在。众所周知,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它不是我们想象的美好单纯的童话世界,而是一种纷繁复杂,充满政治争斗和意识形态博弈的社会文化行为。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从社会文化视界出发,结合英语诗歌经典汉译文本分析,对五四前

1 即 1871 年王韬与张芝轩合译的法国国歌《马赛曲》和德国的《祖国歌》。

后中国这段特定历史时期近三十年间英诗汉译现象进行描述性研究，必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深刻审视和认识五四翻译文学的历史动因、发展脉络，并让我们看到文化译介过程背后的诸多文学和超文学因素，从而更有效地把握五四翻译文学的精神实质。

本课题的研究范围和目标是我国 1898 年至 1927 年所有发表于各种报纸杂志和书籍上的英诗汉译作品，细致深入地探讨这些译作与当时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

我们把研究的时间上限定于 1898 年，具有多重重要意义：不仅是严复 1898 年所译赫胥黎《天演论》既是哲学，也是文学，并首次向中国介绍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世界观，打破了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它和林纾同年翻译的《茶花女》²一起揭开了中国翻译文学的新纪元；更重要的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中所含赫胥黎引用英国诗人蒲伯的诗节《原人篇》和丁尼生的诗节《尤利西斯》，是我国译家最早具有专业水平的英诗汉译作品，标志着从此拉开了中国译家对英语诗歌翻译的序幕（贺麟，1925）。事实上，1898 年是中国翻译史上很不平凡的一年，我们几乎可以武断地说，这一年的翻译成就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模式。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不仅为政治小说的翻译作了学理上的倡导，而且开启了中国翻译文学的功利性目的；严译《天演论》的出版宣告了“信”、“达”、“雅”必将成为中国现代翻译史上的理论圭臬；林纾翻译的法国小仲马《茶花女》改变了国人对外国文学的偏见并提升了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我们把研究的时间下限定在 1927 开始的北伐战争，则是因为此时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基本完成其历史使命，翻译文学已趋成熟并形成其固定文体——白话文体。北伐之后，中国又开始面临日益严重的民族存亡危机，文艺工作者的重心也逐渐集中于此。而其中 1919 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学上都具有分水岭性质。对诗歌翻译而言，胡适先生 1919 年 3 月 15 日发表在《新青年》第 6 卷第 3 号的译诗《关不住了》（美国诗人萨拉·蒂斯代尔所作），无论对于

2 次年出版时改名为《巴黎茶花女遗事》。

诗歌翻译还是诗歌创作都“具有巨大的开创意义”，是对“传统诗歌和传统诗歌模式的巨大突破”（高玉，2001：11），开创了“新诗成立的纪元”（胡适，1984：44~45），无疑也具有分水岭性质。因此本研究在论述过程中将把这30年的英诗汉译分为五四前（1898—1919）和五四后（1919—1927）两个部分，用描述研究方法对比研究它们的特点。显然，这种划分有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在历史维度上能够提供一个更为全面的概貌。虽然前后两个时间段的划分由于“以政治事件为界碑”而略显唐突，但对其总体趋势上的对比研究应该是行之有效的。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谓的研究时间上限和下限并非是绝对不变的，有时为了弄清问题的来龙去脉，这种时间的上限和下限也会有所突破。

把研究对象定为五四前后中国这段特定历史时期近三十年间的英诗汉译的译家和译作，而不是这个时期所有的诗歌译家和译作，是因为我们认为要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深入和系统的描述，必须要有足够的容量空间和时间。同时，我们也认为把五四前后众多的诗歌译家和译作缩小到英语诗歌译家和译作研究，领域相对集中，论述也可望更加深入。此外研究者对除英语以外其他外语语种的肤浅知识也是导致把其他外语语种的诗歌汉译排除在外的一个重要原因。

本课题的研究架构为：从社会文化因缘出发，考察、分析和研究五四前后中国这段特定历史时期近三十年间英诗汉译现象产生的社会文化心理和社会文化功能，并对它们进行译学社会文化行为分析和反思。

我们认为首先从社会文化因缘出发，宏观展示出五四前后中国这段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社会文化思潮及其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思潮中英诗汉译流变的基本走势和特点，能够更好地为深入分析和讨论文其他五个方面奠定基础 and 铺平道路。这是因为我们认为五四前后英诗汉译的社会文化研究实质上是诗歌翻译社会文化史的组成部分，属于诗歌翻译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范畴。因此，我们拟从翻译与文化的关系入手，从两个方面探讨这个课题。一是以接受社会的主体文化为重心，对制约诗歌翻译产生和接受的社会文化心理和诗歌翻译的译学社会文化行为给予关注。通过对五四前后英语诗歌译介活动的系统梳理，将翻译